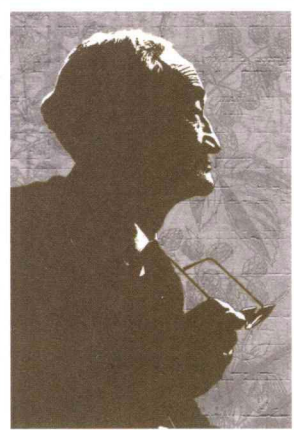


武建国 林文勋 吴晓亮 主编



永久的思念

——李迪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永久的思念

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武建国 林文勋 吴晓亮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 武建国，
林文勋，吴晓亮主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5482-0407-7

I. ①永… II. ①武… ②林… ③吴… III. ①李埏
(1914~2008)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186号

策划编辑：蔡红华

责任编辑：李兴和

装帧设计：刘 雨



永久的思念

——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武建国 林文勋 吴晓亮 主编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43.75

字 数：1119千

印 数：0001—1400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0407-7

定 价：100.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前 言

李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先生字子沂，号幼舟，1914年11月21日出生于云南省路南（今石林）县。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因抗战之故，1938年转入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2年应聘至浙江大学任教。1943年受聘执教于云南大学直至辞世。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后，先生任云南大学教授会主席和云南省图书馆馆长。1953年，力辞省图书馆馆长一职，专门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与此同时，1957年，先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后又曾先后兼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云南省经济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李埏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是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学派的重要学术代表之一，在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形态、古史分期、农村公社问题以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等重大问题上均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先生是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对唐宋货币经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和理论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同时，他创造性地将土地制度史和商品经济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别开生面的通贯性探讨。先生曾先后讲授“中国古代史”、“唐宋经济史”、“中国封建经济史”等课程并招收培养了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出版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宋金楮币史系年》（合著）、《〈史记·货殖列传〉研究》（合著）、《〈滇云历年传〉点校》以及《不自小斋文存》等著作，被学术界誉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者。

李埏先生是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者。1982年，他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建室伊始，即撰写《我爱公孙树》一文，将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比喻为公孙树，先生那种“爷爷栽树，孙子吃果”的胸襟与决心跃然纸上。1986年，在先生的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重点学科加以建设。2000年1月，适应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先生再次倡导组建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云南大学已成为国内重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和唐宋史研究中心，专门史学科也已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李埏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更是一位执著追求的精神伟人。他始终坚持真理，严谨治学，不轻信，不盲从，不自大，不自小，提倡“治史明义”和“通史致用”。20世纪60年代，曾纠正了《资本论》中译本中的重要错误，受到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赞扬与肯定。“文革”中，先生被打成云南的“三家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备受摧



残，但仍坚持科学研究，并发表了《试论历史局限性》等论文，阐述自己对历史局限性问题的看法。90年代中后期，先生已届八十高龄，体力日减，目力每况愈下，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笔耕不辍，完成了对《史记·货殖列传》的研究。他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始终不断地攀登着自我精神和人类精神的高峰；在留给我们丰硕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008年5月12日，即汶川大地震的同一天，李埏先生在昆明与世长辞。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令人倍感悲痛。

为缅怀和纪念李埏先生，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历史系决定编辑出版《李埏先生纪念文集》。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学术界和先生亲人以及师友的鼎力支持，大批专家学者和先生的亲友、学生纷纷贡献美文佳作，先生的夫人赵毓兰女士亲笔为文集封面题签，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汇编文集、校对文稿。篇篇文章、字字句句，无不寄托着对先生的缅怀和忆念，体现着学术研究的开拓和进展。现将收到的文章选编成集。文集共分两编：《学术编》收录学术论文47篇，内容涉及中国经济史、宋史、历史地理、文化史、民族史和世界史等方面；《追思编》收录追思文章19篇，从不同的方面追忆了先生的人生历程、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的事迹和科学精神。

谨以此文集缅怀和纪念李埏先生！

编者

2010年11月

念李埏之先生

古今史家之有純真思維而行之若
無者實少見少知。而論學取之實在，
論道取之平直，論事取之明宜，言之
純然若不及者，代有一、二人而已。春
樹所親、所見之並世學者史家中昆明
延之李先生埏是當此一人。今先生
道歸經月而年，不得奉謁聆化，然其
儒士之神儀、靈宰朝夕典祀而永光，
昭示無竟。因草數言銘詞以為永
念：

淳真儒士 傳道平世文公。
博雅史家 授業數代學宗。

二〇〇九年癸次己丑五月望日
張春樹謹志。

目 录

前 言	(1)
-----------	-----

学 术 编

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吴承明 (3)
中国都鄙连续关系的出现与发展	斯波义信 (6)
简论史志异同	赵德馨 (16)
市场和技术：中国历史变革的关键	郑学檬 (20)
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自耕农与国家佃农的区别	
——和胡如雷先生商榷	侯绍庄 (27)
论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	武建国 (32)
安化峡与华亭等县地理沿革考	陈守忠 (40)
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以中日韩（朝）为主体的历史分析	贺圣达 (45)
“儒家”的起源	顾士敏 (64)
先秦货币史四题	
——中国古代货币史溯源	王文成 (80)
读走马楼吴简札记三则	陈明光 (95)
唐宋时期的墓田	邢 铁 (103)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的唐西州课田簿	杨际平 (115)
6—8 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	邓小南 (124)
The Library of the Donglin Monastery: The Prolonged Decline of a Great Tang	



Dynasty Institution	Joseph McDermott (周绍明) (140)
出土墓志中新见宋代成都范氏资料	胡昭曦 (155)
从宋代的官箴书看《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性质	梁庚尧 (164)
再论宋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高度：以南宋人口、田地、产量为例	方 健 (174)
关于宋代功德寺观的再讨论	
——兼与黄敏枝教授商榷	汪圣铎 (200)
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	曹家齐 (214)
宋代的嫁妆立法	
——以法律文本为中心	高 楠 (227)
<i>Shuihu zhuan and the Military Sub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960 – 1127</i>	Paul Jakov Smith (史乐民) (241)
略论北宋治河管理机制	李华瑞 (288)
雍熙战争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黄纯艳 (300)
北宋中期贡举改革的发展脉络	刘复生 (308)
《参天台五台山记》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所见宋代浙东地区科举 和士人社会	近藤一成 (313)
学术关怀与事功关怀	
——略论叶适的文化批判及其超越	吴 松 (327)
朱熹与《伊洛渊源录》	陈祖武 (332)
南宋王十朋在泉州的政绩	倪士毅 (341)
略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何忠礼 (345)
略述南宋临安府的物价	程民生 (370)
南宋“富民”阶层与乡村借贷	林文勋 董雁伟 (384)
南宋时期长江水道交通研究	张锦鹏 (396)
略论元代江南社会文化的历史延续性	虞云国 (406)
西门庆商业经营的历史特征	
——《金瓶梅》展现出的 16 世纪的中国社会	吴金成 (417)
徐霞客与云南的昨天和今天	朱惠荣 (428)

明清合伙制度的变迁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因素的萌芽	刘秋根 (435)
明清时期的茶叶采摘技术探析	孙洪升 (449)
从同时代欧洲人的视角看 18 世纪中国经济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来自耶稣会士记忆的见解	伊懋可 (Mark Elvin) (455)
清代经济的一些问题	方 行 (460)
有清一代中国西北的民族群体	尤 中 (464)
从家族文书看清代蔡氏族商的财产结构与资本组合	陈支平 (478)
龚自珍佚文系年笺注	刘桂生 (492)
论近世中国的地权市场与生产要素组合	龙登高 (503)
20 世纪前期的云南与早期经济全球化	
——以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商号“洪盛祥”的两部账册为个案	吴晓亮 (516)
1927—1937 年中国商品价格变动探析	刘兰兮 (526)
文庙与云南文化	廖国强 (542)

追 思 编

父亲把我培养成才

——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	李伯重 (553)
舐犊情深	
——父亲对我的关爱	李伯约 (576)
忆父亲	李伯杰 (586)
怀念公公李埏先生	王爱宁 (593)
万山不隔中秋月	
——深切怀念李埏伯伯	张英宇 (597)
真实的人生	
——记李埏教授生前二三事	李龙潜 (604)
悼先师李埏教授	侯绍庄 (608)
李埏先生与我的学术成长道路	武建国 (609)



永远的思念·····	顾士敏 (613)
不自小斋问学琐忆·····	邢 铁 (615)
师恩难忘·····	李 槐 (619)
在先生的引领下成长前行·····	吴晓亮 (621)
导师的作用	
——忆恩师李埏先生对我的指导·····	林文勋 (632)
师 徒·····	龙登高 (637)
从师琐记·····	黄纯艳 (644)
怀念恩师李埏先生·····	孙洪升 (649)
铭铸心中的“不自小斋”	
——纪念恩师李埏先生·····	王文成 (655)
鹤归道山，音容在；薪尽火传，师道存	
——为纪念李埏先生仙逝一周年而作·····	谷更有 (664)
深情怀念李埏先生·····	段 鑫 (667)
 李埏先生年谱 ·····	 (673)
作者简介 ·····	(685)

学 术 编

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吴承明

1986年10月，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丹尼森（E. D. Denison）来北京，在计委研究所演讲他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分析”方法。当时我就想，这种方法能否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回来见到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同志，他们说现在国家统计局虽已采用国民账户（SNA）核算体系，但所提供的数据还不能作出全要素分析，只能用索洛（R. M. Solow）的余值法求得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又听参加投入产出试点区的同志说，较小区域的要素分析比较容易，但不少项目要靠估计。最近见到试图用全要素分析法研究近代荣家企业发展史的青年学者，认为有些要素凭老辈经营者的“经验数据”还是可取的。

丹尼森曾对不同时期美国经济增长作过三次系统分析，又对欧洲八国和日本作过同样的分析。我先将对美国所作时间最长的一次分析的结果列表如下，再讨论它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可行性。

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分析

增长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A）要素投入	1. 90
劳动投入	1. 34
资本投入	0. 56
（B）技术进步	1. 02
知识增进	0. 66
资源配置改善	0. 23
规模效益	0. 26
其他	-0. 13
国民收入增长（年率）	2. 92

表中：（A）要素投入指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投入量；（B）技术进步指这两种要素的生产率（劳动—产出比、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在20世纪初，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略相等，各占50%。以后技术进步的作用加大，到世纪末，技术进步约占70%，要素投入约占30%。

古典经济学把劳动、土地、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丹尼森等现代增长论者是



分析企业（包括农业企业）生产，把土地并入资本要素，或假定土地投入不变。研究中国经济史就不能这样。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史主要就是土地制度史和土地利用史，直到今天，土地承包制还是重要问题，农业还没有企业化。因而必须建立一套土地要素的分析方法。这并不很难，因为土地投入（播种面积）和土地生产率（亩产）都是可以计量的，并有人研究过。

在要素投入中，资本投入、建筑、设备、存货等都是按金额计，只适当计入折旧就行了。劳动投入则需兼顾人力资本理论。丹尼森用了三个子目：（1）就业量；（2）就业者受教育程度；（3）每周工时的变动和就业者年龄、性别的变动，本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是负值。

在技术进步中，丹尼森用了四个子目：（1）知识增进，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研发设计等。这项贡献最大，但却是无法计量的，只能用余值法，即在技术进步的贡献中减除其他三目的贡献。（2）资源配置改善。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可由市场自动优化，这里的“改善”实指两件事：一是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业劳动，二是非农业的不付酬的家庭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转入企业劳动，两者都提高生产率。（3）规模效益，实指市场扩大，节约交易成本，包括企业内部的节约和企业外部的节约。这种节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无法计量的，只好求助于“专家意见”或“经验推论”。（4）其他，包括“立法环境”（国防、保安等）、人为环境（生态、罢工等）以及自然灾害等。这些都不能计量，不过丹尼森认为这些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可设定一个常值（负数），或免计。

丹尼森的全要素分析方法受到后起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挑战。对于经济的发展，结构主义否定了传统的线性增长模式，代之以结构变迁模式，而结构变迁是不能用传统的市场均衡理论来解释的。这在历史研究上就直接与以诺斯（D. C. North）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冲突。新制度学派认为，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改进、规模效益等都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即明确产权，改进组织结构。这种理论在我国颇受重视，因我国正在进行制度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希望能从历史经验得到教益。诺斯还在他的新制度经济史中引进国家和意识形态两个要素。他说在历史上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机制，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意识形态是执行制度的节约手段，它可约束“搭便车”行为。而在我国，国家不仅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他还直接经营经济实体，至今都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起主导作用。在中国，道德、伦理、义利观等，不仅对人们行为起约束作用，还是推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积极因素。

制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而且不可计量，不能纳入丹尼森模型。在新古典的市场均衡理论中，把制度看成是已定的、不变的存在，像地理环境、自然环境那样，排除在模型之外。这在静态或短时间分析中是可以的，而在历史研究、哪怕是当代史的研究中，都不行。全要素分析必须在丹尼森的模型之外另立制度等专项。那么，怎样来分析这些不计量的制度要素呢？

我想，可以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总体论史学方法。布氏的总体论是结构论，总体由部分（研究领域）组成，他的部分中就有国家史、文化史，有地理环境、自然环境。总体论的数学（哲学）命题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总体即各部分关系之和”。历史研究就是研究各部分的关系及其变迁，尤其是各部分与总体的关系



及其变迁。仿此，全要素分析就是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

这种结构关系有因果关系、双向关系、辩证关系，错综复杂。研究它们要用逻辑思维，用归纳法、推理法，分析、综合，又都要有史料证实。逻辑分析能全面观察，分析层次，揭露实质。其实，那种计量模型并不是研究历史的好方法，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函数关系，已属失真，又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所以，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以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

中国都鄙连续关系的出现与发展

斯波义信

一、前言

中国官僚制帝国绵延两千余年，唐代正值其中间时期。在以安史之乱所象征的社会自上及下的巨大变动之影响下，这个帝国开始了新的整合，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可以推测，该社会变动的终极动因，在于人口增长与交通、商业的发展。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起步，尔后呈现着持续发展之势的社会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也与此变动相适应，明显地实现了一大飞跃，并在明清时代有进一步发展。

这样在长期社会变动之脉络中定位城市化之际，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官僚制帝国充分具有吸收社会之变动并适应之的弹性，因此进行了若干大胆而且彻底的调整与修正（如科举制、两税法、雇佣兵制），由此重新维持了官僚制的稳定。可是，尽管如此，无法囊括在调整与修正中的世俗性变化的诸多方面，依然遗留在各处。换言之，唐宋以后的城市化的全景，是以自上而下（top-down）的观点所无法完整把握其整体变化的，应该以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角度来囊括已发现的诸变化并予以综合。在此，我以都鄙连续关系（“rural-urban continuum”或“urban-rural continuum”）这一术语为线索，来尝试考察该问题。

“都鄙连续关系”指的是聚落的分布形式，并非能用城乡二元对立（“rural-urban dichotomy”或“rural-urban separation”）来概括。这种关系的一般状态是城市在其支配领域内，使半城市（half-city）、市场聚落分散在其中，而后者也在其各自的支配领域内使村落分散存在于其中。此形式形成后，除极端交通不便的偏远山村外，通常的村民变为日常性地与半城市、市场聚落接触，自给、孤立的村落的变化有限。“都鄙连续关系”形式出现于唐代中期，逐步反复扩散与集中，到了明末进入普及的阶段，而至清末、民国时期则日臻完善。面对出现于传统性的上级城市（国都、省城、府州城、县城）之下一层次的半城市、市场聚落的成长，直到了清末，国家未能得出有效调整城市聚落的策略。关于此事之意义，将在其后考察。

那么，唐代以前的聚落模式是如何的呢？可以想象，基本上是都鄙二元对立（rural-urban dichotomy）式的。我这样推测的关键有几点。第一，汉代在城市级的大聚落中存在20座乃至30座城内人口超过10万的巨大城市；相反，在南北朝时期，除了邸阁（邸）等交通运输线上的中继站和大市、小市等交易据点散见于干线道路上外，没有证据说明存在市场聚落之类。另外，并未固定实施通过税（过税）。第二，在聚落名称上，也仍未发生使



人联想到都鄙连续的状况。在汉代，无论是“城市”内的居住区还是农村地区的一般聚落单位，都被称为“里”，并未达到明确区别都、鄙之程度。“村”乃至“乡村”作为农村聚落之称呼而出现，“城市”与“乡村”转化为对立概念，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一点使我们推知，在政府登籍的人口剧烈减少的南北朝时期，因开拓等造成的渐进性人口增长在各地发生，并且与动产、不动产交易之发展相关的惯行、制度、术语之增加，也出现在东晋以降（换言之，私榷之成长）。

二、唐宋时代都鄙连续关系的出现

唐代中期以降，在聚落分布之样式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在大小聚落的各层结构方面，在其中、下层部分，半城市、交通商业聚落、市场聚落明显地出现了；在地理空间方面，也形成了“城市”、“非农业集落”、“村落”三者交互散存的状况。并且，“村落”变得并不一定是孤立、自给的单位。可以推断属于全国性状况的有力证据，便是在两税法导入（780年）的同时，统一实施了从价2%的通过税（过税），其后二年实施了从价3%的落地税（住税）。这两者在五代合而为一，称为“商税”，在宋、元、明、清是重要的政府财源。1077年度的全国商税统计在《宋会要辑稿·食货门·商税》一五至一七中得以幸存，使我们能弄清设有商税务、商税场的大小聚落（计1867处）之所在、地名、课税额。同时，尽管不完整，《宋会要辑稿·食货门》二三盐法、一九酒麴杂录中还保存着关于同时期盐税场、酒麴税场的相同数据。这些记载，为我们进行细致分析提供了线索。

关于该商税统计名目上的商税务、商税场，就聚落的层次而言，全部都城、府州军监城及大半县城都在内。关、寨、砦、堡之类，以及坑冶等，只要是商业据点，也都包括。而另一方面，在县城以下的层次上，就镇来说，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大镇。诸多的小镇虽未达到具有商税务资格，但是类似的状况也适用于作为交通聚落的店、津、埭、步（埠）等，还包括作为市场聚落的市。总之，尽管该统计是具体说明聚落等级的稀有史料，但作为掌握交通聚落、市场聚落层次的整体形象的史料，则尚有其不足之处。周藤吉之师曾在所有宋代史料中，认真地寻求各种名称被命名的市场聚落的所在分布。此项研究使我们得知：在中国北方，除镇普遍存在外，称为店、市、步的聚落也颇多。但是因论及这种聚落棋布实情的证据比较分散，因此未免有隔靴搔痒之憾。为填补该漏洞所采用的方法之一（而且是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充分利用旅行日记。在此举出一例。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来到中国的日本天台宗延历寺僧人成寻，于同年获准参拜山西代州五台山大华严寺。他从首都开封府达目的地，去程耗时26日，行程1487里；回程则耗时24日，行程1580里；合计3067里，往返路线几乎相同。他把沿途逗留、住宿的交通聚落，详细记录于《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在67年后的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郑刚中作为视察宋金接壤地带（陕西、四川方面）政情的使节团之参谋，记录了往返经过首都杭州与凤翔府间同一路程中之逗留、住宿的聚落，尽管较为简略。很巧的是两部纪行在开封府、郑州、孟州、河南府（洛阳）部分途经同一路线。下面以成寻的记录为基础，来窥视一下具体情况。在下文中，成寻行纪简写为《成》，郑刚中行纪简写为《郑》。

《成》：开封府顺天门12里，同府祥符县新点（店？）马铺、永福院【宿】15里，同县八角（镇）马铺15里，同县醋沟马铺10里，（同府中牟县？）十里店马铺、中牟县治三异驿12里，同县义井马铺12里，同县白沙（镇）马铺【宿】12里，郑州管城县圃田（镇）